

“中东欧转轨二十年： 经验与教训”学术研讨会综述

徐 刚

2010年10月14日,由北京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CCEES,PKU)和北京北方卓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与会者来自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央编译局、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山东大学、山西大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世界知识》杂志社、《环球时报》等单位,约50余人。与会学者围绕“为什么以及如何研究中东欧”、“如何评价东欧剧变”、“如何看待中东欧转轨中的成就与不足”及“中东欧社会发展有无规律可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为什么以及如何研究中东欧?

与会学者认为,与欧美大国和周边地区的研究相比,尽管中东欧地区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呈现被边缘化的态势,但中东欧国家与中国曾经有着的共同经历、同处于转型阶段及中国与欧盟关系的维系,使中东欧研究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阐释了中东欧研究的意义,提出了研究的新思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从情感因素及其转轨的经验教训来说,中东欧地区都值得下大力气研究。一方面,中东欧国家曾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感情角度讲,把它作为认真探索、追寻的对象,对中国而言非常有必

* 徐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要。另一方面,分析和总结转轨20年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可以加深对该地区复杂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给我们许多启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宗良教授认为,中东欧的历史与现实有许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课题。第一,东欧研究不仅是剧变史研究,而且是一个通史研究,东欧剧变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深入分析这些综合因素能够从中寻找扫除现实羁绊的“药方”。第二,西方和东方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对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深刻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盲目歌颂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很危险,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的观点也值得商榷。事实上,东欧社会主义并没有死亡,而是在经过一次大的挫折之后,以另一种形式顽强地向前推进,死亡的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萧群副部长认为,从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对外关系的角度来说,中国学界不应忽视中东欧研究。第一,东欧国家4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以及期间东欧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两者不同的历史命运及其原因也值得深入研究。第二,剧变后的中东欧国家先后加入欧盟,它们在欧盟框架内的对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对欧政策。

北京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孔寒冰教授从社会发展现实、对外战略及地区或国家特性方面强调了中东欧研究的意义。第一,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同处于轨转进程中,它们的成功经验与转轨中出现的问题都值得借鉴和思索。第二,欧盟是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中东欧国家陆续加入或准备加入欧盟。因此,中欧关系的发展变化需要我们加强对中东欧地区的研究和认识。第三,中东欧地区是不同文明的交汇地带,研究其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宗教格局对该地区社会历史的影响对于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也有与会者认为,中东欧国家在转轨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形成了一些经验,但不能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等量齐观,而且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国家战略大不相同,因此中东欧国家的转轨很难给中国提供实质意义的经验价值。

总的说来,中东欧地区在中国政治与外交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东欧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研究偏向于社会主义时期,这在有关教学中也体现得较为明显。对此,与会学者强调要加强对中东欧地区进行全方位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研究思路。

王逸舟教授认为,应在整体上把握中东欧社会发展的碎片化现象。中东欧地区是一个“不同民族、种族、语言、方言、宗教、文化的万花筒”,不能简单把这个“充满差异的世界”看成是“铁板一块”。在转轨过程中,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程度上存在不同层级和梯次,因此在研究中必须找准一个参照系,从而把握一个“正在分裂”、碎片化的中东欧。

孔寒冰教授认为,应从文明出发把握中东欧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东欧研究不能再因循以往的研究思路,应当注意中东欧在时间与空间的变异性、内部与外部的统一性,以及宗教、民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完整性和多样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冯仲平研究员认为,应从动态中把握中东欧各国发展的差异性。虽然中东欧国家在冷战后集体“回归欧洲”、努力去适应西欧模式,但是转轨的主动权还是在他们自己手中,而且每个国家如何发展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在研究其经济、政治及外交转轨时都需要注意国别的差异性特征,从中发现各自的特色及生成逻辑。

山西大学王志连教授认为应从方法和区域上把握中东欧研究的整体性。研究中东欧在方法上要注重历史方法、政治经济分析及比较方法的运用,在区域上注重东欧与苏联、南欧、南美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对比研究。

二、东欧剧变是“悲剧”还是“喜剧”?

与会者还就东欧剧变的评价问题展开讨论。黄宗良教授认为不能简单以“悲剧”还是“喜剧”来评价东欧剧变。从前苏联把自己的社会模式、价值观念强加给东欧,最后造成剧变结果,共产党丢掉了政权,这是一个“悲剧”。如果东欧当年走人民民主这条路,可能发展比今天要好。然而,从剧变后的社会发展来看,当前中东欧在政治体制上和西欧的议会民主制没有很大差别,或者说在不断西欧化,经济上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其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王逸舟教授认为,简单或一刀切式地评价东欧剧变、看待东欧 20 年的变化是不客观的,在当前的中东欧地区似乎越往北越容易打高分,往南则易给低分。以波兰和南斯拉夫为例,前者转轨的成就有目共睹,后者剧变后兄弟阋墙的代价容易使人怀念社会主义时期的成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郭洁副教授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认为东欧剧变是一场“悲剧”还是“喜剧”很难下定论。例如,在有关东欧剧变的原因上,国内外学者均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制度决定论”或“个人决定论”,而是众多因素的交织与互动;在东欧剧变的进程上,有学者从剧变后各国无一例外地向“民主化”、“市场化”和“欧洲化”目标迈进,从而认为剧变是“预设”的;也有学者认为剧变是突如其来的。在东欧剧变的方式上,除罗马尼亚外,东欧国家的剧变均以非暴力的、和平的方式完成,这提供了许多思考和研究的空間。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认为,评价剧变应该从本国人的民意出发,他援引的一组波兰关于“1989 年的制度变化是否值得”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1994 年波兰人认为剧变值得和否定的比例分别为 40% 和 28%,

1999年分别为72%和17%,2009年分别为82%和8%。

三、如何看待中东欧转轨中的成就与不足?

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东欧和东欧剧变的研究相比,有关中东欧转轨的研究在国内学界仍处于起步阶段。与会者对“经济转轨是否已经终结”、“政治转轨与民主化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新民粹主义的兴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首先,经济转轨是否已经终结?与会学者认为,中东欧经济转轨的任务基本完成,但是转轨并没有终结。孔田平研究员认为,由于中东欧国家私有经济已居主导地位、经济决策日益分散化、资源配置市场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因此经济转轨的任务已告完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转轨的终结,转轨中尤其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中东欧国家对经济增长模式作适应性调整显得更加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朱晓中研究员认为,中东欧国家转轨过程中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增长模式的困境,金融危机迫使其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从这个角度看,经济转轨仍有漫长的路要走,整个地区更是如此,因为不同国家的转轨进程与效果均有所差异。他还提出中东欧国家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应具有如下特点:弱化外资依赖、鼓励居民储蓄并用于经济增长、完善信贷、改善支出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实施积极的移民政策等。

其次,民主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与会者大多认为,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均实行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转轨,但各国的模式、进程与特点都不尽相同。同时,民主化不是中东欧政治转轨的终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项佐涛博士从经济、文明、国际及民族主义因素的“组合效应”出发,把该地区的政治转轨总结为以波兰为代表的平稳演进型和除斯洛文尼亚外前南地区的冲突裂变型两种模式。虽然这两类国家均以民主化为目标,但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实践要充分考虑一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民主化不是中东欧历史的终结,民主制度的形成并不是强制移植而是多样性培育的结果。中央党校胡振良教授认为,政治转轨研究的价值在于充分认识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等于简单的西化,需要结合国情而不能简单地移植。中央编译局季正矩研究员认为,为了民主而民主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方面要看推行民主后对老百姓是否有利,另一方面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要求民主表现形式的多元化。民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慢不得也急不得,中东欧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第三,新民粹主义的前途如何?与会者认为,近些年来,新民粹主义的兴起及政治“向右转”对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安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项佐涛博士将新民粹主义的兴起概括为平稳演进型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以带有民粹主

义性质的政党纷纷上台执政为标志,如保加利亚的公民欧洲发展党、罗马尼亚的民主自由党、斯洛伐克的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人民党、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以及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等。对于新民粹主义的前景,与会者看法不一。项佐涛认为,由于传统政党在诸多问题上的能力缺失,使意识形态随意性、政策投机性及领袖魅力型的新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有较大市场。冯仲平认为,虽然新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地区广泛存在并做出了不俗的“表现”,但不会形成“大气候”,将会逐渐衰落,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式微就是最新例证。朱晓中认为,新民粹主义的兴起及政治“向右转”的风向确实使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困境和挑战,虽然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尚未成为中东欧地区的主导政治力量,但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气候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地区“民主褪色”的担忧和疑虑。清华大学史志钦教授认为,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与西欧趋同,但就民粹主义政党来说,其缘起、特点与趋势则有所差异,不能简单地等同,应理性看待民粹主义在这一地区兴起的原因并评判其未来走向。

四、中东欧社会发展有无规律可寻?

中东欧地区是一个不同文明的交织地带,其地缘政治、民族构成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非常复杂,历史发展也曲折多变。与会学者围绕中东欧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讨论。

孔寒冰教授认为,文明是整体上、宏观上理解中东欧国家的一个共性视角,中东欧国家的命运一直受制于不同文明及其大国载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历史上看,中东欧国家存在“集体漂移”的表象,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被“硬切割”与冷战后的集体回归欧洲,在不同历史时期游走于西方和东方之间,难以确立归属,其原因在于:第一,中东欧国家虽然都有自己的早期文明,但遗憾的是没有整体地延续下来,先后被大国文明所浸染甚至吞没,在经历数个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国)的侵扰或影响过程中,其自身文明的归属出现了矛盾性和不确定性。第二,大国是文明的载体,中东欧国家的历史是一部大国争夺的历史,所有不好的后果均由这些国家来承担,大国阴影挥之不去,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生”、“死”和“怎样活着”等重大问题都由大国决定。从现实来看,在“集体漂移”的表象下,中东欧不同国家呈现出了或明或暗的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在客观上依然具有很深的文明痕迹,即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或混合宗教国家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未来看,中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将加入欧盟作为最终目标,步入一个大欧洲的家庭,但能否共处一个和谐的家园继而建设一个欧洲合众国取决于经济鸿沟能否填平、文明差异和冲突能否消失、民族“马赛克”问题能否解决,以及国家身份与欧洲认同能否统合,这些问题

已成为中东欧国家甚至是欧盟的发展困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关贵海副院长认为,文明对中东欧国家存在一定的影响,但不应该夸大文明的作用。一方面,弱小国家虽然存在社会发展的被动性现象,但也不是完全受文明支配,任凭大国决定,尤其是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因此,对于小国或弱国的艰难选择的看法不宜太悲观,有些国家如瑞士、芬兰及新加坡等在国际社会中就较为成功,而且小国或弱国日益具备了颠覆国际关系准则的可能。另一方面,分析以宗教为标识的文明与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关系时不能带有价值导向,并注意世界范围内的不同适用性。

还有学者认为,冷战后中东欧国家真正拥有了自我展示的机会和舞台,越来越主动地融入欧洲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赵刚副院长认为,不少中东欧国家的民众认为现在是中东欧四百年以来难得的历史机遇期,这些国家第一次有机会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融入到欧洲文明的发展潮流中,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就好像是“潜力股”,推动中东欧国家向较好的前景发展,波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孔田平研究员也认为,一些中东欧国家的学者认为过去20年的转轨是他们本国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这在过去二、三百年中都不曾见到的。虽然入盟后的中东欧国家仍存在一些困境,但不能由此放大欧盟东扩的负面影响,中东欧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获得的经济成就,以及所展示的国家能力正日益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高歌研究员从中东欧国家外交战略与大国关系互动的视角出发,认为中东欧国家虽然仍处于美、欧、俄的夹缝之中,其外交战略深受大国关系的影响,但中东欧国家在谋求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进程中,其外交主动权不断增强且对美、欧、俄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们不只是夹缝生存,且能左右逢源。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光明教授从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视角出发,认为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一方面,现代化所呈现的不是一个普遍发生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传播的过程,传播到哪里就会出现被源发地西方“拉扯”的现象,与传播地的社会结构和文明产生激烈的冲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主导地位不仅影响着中东欧小国,也影响着该地区的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欧小国被迫跟着苏俄走,但苏俄的社会主义是官僚社会主义,它并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的成果,所以一旦遇到松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东欧国家就希望摆脱苏俄的控制,追求自己的欧洲化。中国人民大学蒲国良教授从内生还是外源的角度出发,认为分析和认清中东欧国家的碎片化是文明碰撞还是文明撕裂,是国家内生抑或是综合因素的结果非常重要,这关乎历史上牵动和改变该地区结构的究竟是外力作用还是其主观意愿的选择,也启发了对文明、宗教、民族等问题的思考。

与会者还就社会主义时期的东欧研究、中东欧国家的安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